

杏壇生涯二十年

蕭 富 美

今年暑假，外子和我在杏壇上已整整服務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時間雖不算長，也不敢說桃李滿天下，但對我倆在平凡的背景下走上二十年的學術生涯，說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十年來，在杏壇路程中有不少值得慎思的經歷，擬就所感，札記，以資紀念。

×××

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在台大行政大樓傳鐘前的廣場唱完驪歌以後，即被學校以「留校察看」之名扣留下來，從事研究工作，由於師長們的厚愛與鞭策，使我在那充滿活力的優美而安靜的學術氣氛裡，孕育了學術研究的基礎。記得有兩位恩師啟發我最深，一位是聞名遐邇的國際法權威雷公白韋恩師。他曾一再勉勵我：在這環境裡，如能安心而又專心從事研究，選定自己將來所要走的學術旅途，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另一位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虔誠信徒，三民主義思想理論的泰斗，傅公述文恩師。他也曾勉勵我：從基層幹起，不為四周圍的雜音所擾，定下自己的目標，努力去奮鬥！二位恩師的勉言，仍歷歷在耳邊，二十年來無時無刻不敢或忘，鞭策自己，不敢怠忽。

民國五十年，完成了第一篇以「秦越邊境間

題之研究（一九四〇—一九四五）」為題的論文，恭請 傅公指導斧正。記得恩師這樣鼓勵我：你能「近水樓台」，承襲你父親的衣鉢（家父當時在台大講授「東南亞經濟問題」及「華僑經濟」等課程），從事東南亞政治之研究，下點功夫鑽研專攻，做一個「墾荒者」，前途必不可限量。辱承 恩師嘉勉，更努力研磨。由於當時系務單純，有許多時間去進修，因此常利用時間去政治大學修讀「東南亞政府及政治」，同時也在本校歷史學系，選讀「東南亞史」，獲益良多。其後陸續發表有關秦越問題之研究報告多篇，奠定日後在此方面之基礎與興趣。

×××

民國五十三年八月，承恩師張公守中之關切，介紹一位在本校農學院執教的楊君相識。我真慶幸在被「留校察看」後，得到這麼好的機緣，解決了我的終身大事。由於我倆興趣相投，且年紀已不小（當時我已屆而立之年），加上學校正好在松山永吉路新蓋一棟教職員宿舍，配給眷屬居住，我倆擬以所住單身宿舍，分別交還校方，另申請改配眷舍，但因尚未正式結婚而被拒。為了省下婚後租借房屋之煩惱，並省下一筆可觀的房租，於是民國五十四年二月底，經雙方家長同

意，即奉「宿舍之命」，提前辦理完婚手續。從認識到結婚，只不過六個月的時間。好在我很早就對婚姻大事訂下「擇偶八原則」；外子的條件，幾乎有百分之九十九，合乎我的八大原則。因此，我們的結合相當美滿。外子在做學問方面，以及待人接物方面的態度，對事情的分辨與判斷力，大致與我「異曲同工」。在我們的生活圈內，隨時警覺、堅守原則，憑理性行事為人，不貪小便宜，事事依道德良知而行，絕不計較個人名利，乃以全體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維持着人間與生活上的和諧。

×××

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在黃公建武老師的鼎力提拔下，我第一次上講台，講授「東南亞各國政府及政治」。有二十位同學選讀。記得上講台後的第一句話，是和同學們訂立「約法三章」（此三章迄今仍如此行），其一章為：上課中，我是同學們的老師，大家嚴守秩序。但下課後，我們是先後同學，不必受師生間任何拘束。第二章為：求知識乃為學問而學問，不要只為考試而學問。要求得真實的學問，一定要靠平時多讀、多想、多問、多學，不要只應付考試，濫竽充數，後果不堪設想。第三章為：因上課時間太有限，無

法在課堂上——接受同學們的質問，但歡迎在課下課時，相互切磋研討。由於訂了「約法三章」的關係，同學們對我的接觸，都不受一點拘束，大家有話必坦誠相見，有問題就提出來討論，互相交換意見，很理性地去思索判斷，為同學們解決不少生活上、學理上、生理上的困難。這是執教二十年來唯一值得安慰的一大收穫。

×××

婚後一年半，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很倖倖地榮獲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學術研究獎助金」，被派往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部「東南亞研究中心」，從事戰後日本與泰國外交之研究。據悉，當時從事此一研究者，僅只三人。其中一位是泰國朱拉隆功大學（University of Chulalongkorn）的政治學教授戴拉維博士（Dr. Khien Theeravit），另一位是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的東南亞政治史教授石井米雄先生。他是一位年輕而知識淵博，更具語文天才的學人，曾在駐泰國使館任參事多年，說的一口流利的泰語。留日期間，承指導教授豬木正道先生的悉心指導，完成「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泰外交之研究」。為了充實自己的專長，並便於查閱有關泰國的原始資料起見，我特地抽出半年的時間，專心學習泰語。民國五十六年夏天，在京大東南亞研究中心之協助下，很高興能與泰國的戴拉維教授，和日本的石井教授，在京都近郊風景極其優美的名勝地——比瀨山，舉辦一次盛大的「國際東南亞問題研討會」（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South East Asian Issues）。

會議由豬木教授和矢野教授主持，共有十國學者，分別宣讀十五篇論文。我也很榮幸代表中華民國的「學人」，以「一九四一—四五年日泰外交關係」為題，做三十分鐘的論文宣讀。在研討會中，國際學人均能重視我中華民國的學術地位，熱烈討論。此乃畢生感到最光榮之事，也由衷地感謝多年來在國內接受各位師長的指導與薰陶下所播下的一點成果表現。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天研討會結束後的晚宴上，有位年約六十歲的京大教養學部長柴田清教授（講授文學部的中國語文學），很親切地端着一杯香檳酒，走到我面前向我舉杯祝賀，一再口口聲聲稱讚並感佩。先總統蔣公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對日「以德報怨」的崇高精神，囑我有機會曾見蔣公時，一定要代轉其感恩之誠。當時我也很受感動，不由得流下興奮的眼淚，在晚宴中的感觸，實在太多了！

×××

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已是我與外子奉「房屋之命」結婚後的第五個年頭了。在計劃生產下，蒙上帝恩賜一女孩，從此家裡添了一小口子，感到更熱鬧、更有趣。因婚後先作妥善的「生產計劃」，在經濟上稍打好基礎後才生育，因此孩子的降生，並未帶給我們在任何煩惱。其實，以我們倆人都有固定收入的經濟情況下，再為國家社會多生一個孩子「增產報國」，以合乎家庭計劃所推行的「兩個孩子恰恰好」的口號，是決不成為我們精神上或物質上的負擔。但是，外子却很理性地能自我節制，倒提倡「一個孩子

不嫌少，女孩要比男孩好」的口號。因堅守一個孩子不嫌少的原則，獲得了不少好處。對孩子來說，因人口簡單，經濟寬裕，生活安定，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面均能易於顧全。孩子在物質與精神方面亦均能過着舒適而快樂的生活。對父母親來說，其優點更是不勝枚舉，例如可以專心照顧孩子，專心教養孩子，減輕家長的精神負荷等等。

×××

民國六十一年夏天，因我倆工作上較為忙碌，乃經「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台北兒童福利中心實驗托兒所」主任蒲陵教授之特准，將小女送入該托兒所全天班就讀。（按該所規定托兒必年滿三足歲，小女才滿二足歲半）。當時我的心裡實在矛盾，而且有些「殘忍」的感覺。一個剛滿二歲半的幼兒，能適應托兒所的新環境？在其幼小心靈上，會不會受到無謂的打擊？影響幼兒身心上的發育？會不會……經過約半個月的思索，最後還是「狠心」地把小女送進托兒所。很欣慰的是這所的師資、設備、環境俱佳。小女在這優美環境下，學習許多新的知識，在德、智、體、群各方面都能均衡發展，尤其對一個獨生女來說，能進入這麼一所高水準的托兒所，一方面使小女與外界多接觸，自幼養成合群守法心理，過着團隊生活，使孩子的性格不致太孤僻、自私，同時也從團體生活中學習一些善良的習性。

民國六十二年仲夏，因教學與研究工作上的需要，不得已自松山搬到新生南路居住，小女也不得不向兒童福利中心實驗托兒所告別，轉入位

居溫州公園邊的一所歷史悠久的台北私立幼稚園稚園小班。該園除了環境受都市地皮的昂貴影響及地皮本身不屬於該園所有之因素而稍見遜色外，其餘均可與兒童福利中心托兒所相媲美。從園長周靜仙女士以下，至各位老師們，與孩童均打成一片，尤其值得一提的該園對職業婦女，更是考慮週全。園裡每天看顧孩童的時間，自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半，甚至到六點鐘為止，以配合職業婦女們的上下班時間，家長們均無「後顧之憂」地把孩子完全交托在園裡，師長們的負責、熱誠與辛勞的服務精神，實在令人感佩！民國六十三年，由於台灣電力公司與該園之契約期滿，無法繼續使用，乃遷至景美。因交通上不甚方便，所以我們又把小女轉入坐落在該園附近的中華基督長老會信友堂附設的「信友幼稚園」中班。六十四年讀完大班而結業。信友幼稚園是一所教會學校，幼小心靈在宗教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寬容、忍讓、謙沖等教義下，學習許多待人處事的道理；堅定信心，彼此相愛，發揮高度愛人如己的美德。小女的幼年生活，真可說「多采多姿」。雖然先後換了三個幼稚園，但都是水準相當優異的好學校，因此對她的啟蒙教育，奠下良好的基礎。民國六十五年，小女正式進入台北市立古亭國民小學一年級，雖然接受正式國民教育以前，已先後讀了三年半的幼稚園，但並未發現對學校生活有些微的「油條」，她很喜歡上學，求新知、交朋友。每天早上，活潑潑地由我陪她上學，下午由她父親平平安安地接回家（小女可以自己上下學，但爲了增加父母親對她

多一份關懷和接觸，我倆數年如一日地陪送小女）。當白天孩子上學時，我倆也盡量利用這段時間出入於家庭、研究室和講堂之間，全心全力灌注精神於學術研究。晚上九點半，當孩子熟睡以後，我倆再開始整理教材，準備講義，寫作等。在我們上床前，還必反省一日所爲，尤其對孩子是否施以愛心關懷，並計劃明天的工作。我們就這樣三人「相依爲命」地生活了十五年，始終如一日！

×××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是歷史上一個悲痛而哀傷的日子；一代偉人，我們所敬仰的蔣公，在驚天動地的大雷雨聲中，突然離我們而去，震撼全世界。消息傳來，舉國上下，地無分東南西北，人無分男女老幼、貴賤賢愚，大家披麻戴孝，如喪考妣，淚如泉湧，心如刀割，痛哭失聲。當我在課堂上抑不住心中的悲悽，講述蔣公德業功勳和對他老人家的崇敬時，已哽咽不能成語。同學們勸我不要過份悲傷，並問我爲什麼如此崇敬蔣公。我答以蔣公的人格、思想、行誼均大偉大；在大一時，我曾讀過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共三十卷。從蔣公手著裏，我看出他不只是一位傑出的政治領袖，也是一位軍事戰略家、經濟學家以及教育學家。他的真知灼見，實在太不平凡！

四月十四日，爲了瞻仰一代偉人的遺容並致最敬禮，我與外子冒着大風雨，從下午十一時等到凌晨三時，才擠進了人山人海的國父紀念館內，我們心情的沉重、悲痛與哀悼，真難以鈍筆來

形容。每當憶起民國五十七年有幸參加在中山樓舉行教授春節年會時，親聆蔣公訓誨，與我們共進午餐之情景，他那親切、慈祥而和藹的容貌，歷歷猶在眼前……。其後，每年四月五日清明時節一到，常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蔣公崩逝時雷雨交加，天人同悲的時刻，由於蔣公在遺囑中諄諄告誡我們：絕不可因蔣公之不起而懷憂喪志……要矢勤矢勇，毋怠毋忽。因此，雖然蔣公已離開了我們，但他的志節、修養和精神的軍民同胞，都化悲慟爲力量，銜哀奮勵，實踐蔣公遺訓——「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開創國家光明的前途。

×××

民國六十六年三月，我突然感染大腸菌炎而動一次不算小的手術。在上手術台前最不放心的，還是我家的大寶（外子）和小寶（小女）。經過四十五分鐘的生死博鬥以後，終於挽回了一條「鼠命」（我的生肖屬鼠），真是意外驚喜！但「禍不單行」，外子於四月十八日參觀蘇澳港工程建設時，不幸在 offshore 翻船落海，對一個不諳水性，也不會游泳的他，全身下到海底，差點鬧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剎那間，只憑他三十年前在新竹中學初二上體育課時所得的知識記憶，挽回他一條性命，真是奇蹟！神的恩典真也奇妙！祂知道我倆還有許多未走的路要走，還有許多爲人父母之職責必盡，因此憐憫了我們。從此以後，我們三口更是相依爲命，誰也少不了誰，更

認識了生命的價值和生活的真諦，只要我們生存一日，對國家隨時抱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信念，謀得國家全體的共同利益，做到犧牲享受，享受犧牲的最高境界。

×××

民國六十七年底至六十八年底整整一年，是我一生中遭致最慘痛的一年，可以說是「國難又是家難」之年。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國內正忙於籌備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選舉事宜時，突然傳來美國片面宣布將於六十八年元月一日正式與我中華民國斷交的消息。雖然我們並不依靠美國而生存，國人都能隨時提高警覺，莊敬自強；在瞬息萬變中處變不驚，自強不息。但對一個國際舞台上最誠摯友誼的盟邦作出如此喪失理性良知的行為，實在令人費解！

民國六十八年元月一日中美正式斷交時，我對卡特之背信毀約，至感不滿，真是政治道德的掃地！從歷史的經驗，發現中國之命運，實在「可憐」！每當接近強壯時，即遭無謂衝擊與破壞，這個世界已無道義可言，如果有之，只在道義顯示其利益時，才有作用，因此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乃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指標，利益至上，而非以道義為依歸，各國之間無永久的友邦，也無永久的敵國。國際間為了「利」而存勾心鬥角的權力外交，無真正的國際友誼與國際道義，真是喪盡天理！

六十八年二月五日先翁廷秀公因病疾惡化——三十年的胃潰瘍，經他本人同意接受一次胃切除四分之三的大手術。手術後的前兩星期，情況

出乎意外的順利，主治大夫也認為以七十二歲高齡，身高一百七十六公分，體重只有四十七公斤的老翁來說，這次的開刀是成功的。不料第十五天的下午，先翁突然大量吐血，經內科醫師以內視鏡檢查結果，發現未切除的另四分之一胃的周圍，又開始潰瘍，證實了先翁具有極特殊性質——多酸性胃潰瘍（一般胃潰瘍患者之胃酸度不高），理應再做緊急切除手術，即可挽回性命，奈何先翁年邁體衰，經過第一次大手術後尚有餘悸，不敢輕易再行開刀。為人子女者也不強求處置，就這樣每天靠着注射高單位蛋白質、血清、葡萄糖及鹽水來維繫生命，一直到四月六日清晨三時十分，先翁像在酣睡中一樣，很安詳地與世長辭。想起自民國五十四年春天，嫁入楊府以後，我對先翁那慈祥、和藹、明理、愛護媳婦比其親生子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印象中，面對先翁突然棄養，無以為報，感到無限悲痛。我與外子因一直忙於在台北教學研究，平日無法隨侍在側（先翁祖居新竹縣香山鄉），近兩年來甚感未盡為人子媳之孝道，乃每月按時回竹省親一次，聆聽教誨，也藉以聊盡孝思。本年年初先翁痼疾稍痛，日夜侍奉湯藥，祈盼早日康復。不料天不假年，自先翁昏迷到辭世，前後只不過十五個小時，我們心裡一點兒準備都沒有，先翁也再沒有對我們說一句話，就這樣，我心目中最偉大的公公，從此悄悄地離我們而去……：想到此，心如刀割，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只好將此未了之孝思移在婆身上，誓願一生盡心盡力盡意地去奉養婆婆，以慰先翁在天之靈。

×××

六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一個炎熱的中午，家父從銘傳商專下課回家（家父於民國六十四年以古稀之年奉命從台大退休後，轉任私立銘傳商專教授），因他老人家平日勤儉慣了，再大熱天或下雨天，也捨不得搭乘計程車，當時他手裡還捧着一大堆剛借來的有關經濟方面的參考資料，又重又累，回到家裡，突然發高燒而無法排尿，家母撥電話給我，要我馬上回娘家帶家父去公保就診，經泌尿科檢驗結果，診斷為一種「長壽病」——攝護腺肥大症（因得此症者大半是六十歲以上的長壽者，故醫生均稱之為「長壽病」或「富貴病」）。囑以立刻辦理住院手續。因那天是星期六下午，只好火速轉往台大附設醫院急診部，但無病床，家父又不習慣住在那「大雜院」裡，只好抱病回家等候有病床騰出時再去住院。十月一日，台大醫院通知我們前來辦理住院手續，家父即住進五〇四病房。經過醫師們親切而仔細地為家父作完規則性體檢後，十月十一日上午八時半接受手術。家父一向最怕打針住院，這次難逃此一恐懼，鼓起勇氣，忍受一次大「挑戰」。家父雖年屆七十五，但一向身體康健無恙。據統計，開刀後約一週拆線後即可出院。但是家父動手術後「運氣」似不佳，十月廿五日台灣光復節那天，可以說是父親苦遊「十八層地獄」後起死回生的日子。由於適逢例假日，醫院裡只有幾位住院醫師，在家父開口惡化，肚皮高漲時，他們却束手無策，我不辭辛勞地走訪為家父動手術的主治醫師移駕急救，但未得如願。最後承一位總

住院醫師犧牲假期，特來處置。對這位總住院醫師之親切服務精神及悉心關照的醫德，至為感佩！再經過約三週的療養後，十一月十七日，在全體醫師及護士小姐們的祝福聲中，家父還算順利出院。如今已逾十個月，康復奇速，精神煥發，子女莫不欣慰感恩。

×××

熬過了民國六十八年的「國難與家難之年」以後，我們都重新打起精神，更發奮圖強。政府為了強化國人對自己國家處境的認知，堅定信念，乃決定民國六十九年為「自強年」。元旦開國紀念日的清晨，我們一家三口即趕到總統府廣場前，參加升旗典禮，表示我們對國家的崇敬，誓為政府後盾，莊敬自強，處變不驚，親愛精誠，團結更團結，面對事實，以無比信心，追隨蔣總統經國先生反攻大陸，解救苦難同胞，早日光復河山。

二十年前，由於父母的培育和自己的興趣，加上恩師們的教誨指導，使我下定決心，走上教學與研究的路途。因此每天戰戰兢兢，不敢怠惰，惟恐誤人子弟。除了一天中約抽出四小時做些家事與陪伴孩子，五個小時的睡眠時間之外，其餘的時間，大半花在收集有關教學研究資料及撰稿等，每年都得改變教材內容，隨時改進教學方式，常鞭策自己：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停滯就是落伍！但是人究竟不是聖賢，能力有限，因此也不敢祈望得到同學們百分之百對我的敬仰和擁護，只是盡力而為，求得心安，正如古人所說：「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罷了。平常我

對同學們因材施教，因勢利導，配合國情與社會變遷，予以機會教育，注重同學們思想的啟發，情緒的陶冶，希望每位同學都成為有血性、有理性、有德性、有群性的「龍的傳人」！

二十年來，不敢說桃李門牆，春風廣被，但有不少同學已成家立業，輝煌騰達。值得安慰的是：同學們畢業後，仍不斷地與我保持連繫，每年教師節和新年，都會收到同學們從國內國外寄來的賀卡，問候寒暄，有時也會提到他（她）們在家庭感情生活圈上或在創業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樂趣或難題，甚或自動找上門來互相切磋，分享快樂，常有從黃昏談到夜闌人靜，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

二十年來，隨着時代的改變，生活的現實化，無形中也影響了同學們求知的態度，若與我求學時期比較，發現有不少的轉變，因限於篇幅，僅就大要檢討：

第一：二十年前，我們求學的態度是「為學問而學問」，而今同學們大半是「為考試或文憑而學問」。因此同學們在課堂上接受教育的態度也不同。二十年前的學生，上課時有嚴肅的一面，也有輕鬆的一面。有時討論問題時，大家聚精會神地熱烈探討，針對問題之重點作一理性思索，求得一客觀的評估，因此很能滿足知識的飢渴。但二十年後的學生，上課時的氣氛大不同於前，死氣沉沉，已失去學生應有的天真活潑，如提出問題討論時，其反應不甚熱烈，有時還文不對題地發揮本意，甚至衝動而失理性，作無謂的攻

擊與批評，爭的面紅，使討論會成為強辯會，得不到客觀的結論。為人師者，只有搖頭感嘆，教起書來也越覺之味。

第二：二十年前同學們上課時，大半親自作筆記，對師長的寶貴言詞，都依依記下來，作為日後永久的參考，但二十年後，由於影印機，如「全錄」(Xerox)、「優美」(U-Bix)等太普遍化，價錢又太便宜，同學們都懶得作筆記，上課時不是看別的書，就是想別的事，甚至打盹。全班只選一、二位成績比較好的用功同學代表作筆記，一到考試前，大家都搶借去複印，然後應付考試即了事，可見求學精神，已較前遜色。

第三：我當學生時，常會主動找機會與老師們接近，有時在學校研究室或教師休息室，有時也專誠到府拜訪老師，從課程範疇談到課外讀物之選讀，探討其內容，分析檢討，表示自己的看法等。有時也談些個人生活方面的情趣，不知不覺中，師生間建立很好的感情。但二十年後的學生，似乎較為冷漠，缺乏熱情，不太容易和師長主動接觸。直到近幾年，教育部在各校設立導生制度，藉導生活動增進並加強師生間的連繫以後，師生間接觸的機會較為頻繁，導師也藉機特別注意學生品德的陶冶，思想的啟發，國民生活規範的實踐，並為學生解決生活上的、學問方面的及處世之道等等。導生制度不單給學生獲益不少，為師者也隨時鞭策自己須有品德、學術方面的涵養和愛護子弟的一片熱忱。

第四：二十年前大學生似男生多於女生，甚至有不少科系清一色是「和尚頭」。但二十年後

，則有女生多於男生的現象。如政治學系，考古人類學系等，以前女生選讀這些系的寥寥無幾，但目前有男女各佔一半或更多的現象，這是否表示時代進步？思想也進了步？

第五：二十年前學生的文筆，比二十年後的學生好多了。不知是否近數十年來的大學入學考試改以填鴨式，多重選擇式作答，很少有申論題的關係而大受影響，使近年來學生只懂得A B C D E及(1)(2)(3)(4)(5)五個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其他的都似懂不懂！因此學生們一進大學以後，不論是在作讀書報告或寫申論試題時，都無法申述得很詳盡，其內容也過於簡單，有時還申論不出一個重點來，實在遺憾！

第六：二十年前的學生，除了必修科目外，都能主動修讀一些與自己興趣相關的課程。加上學校的淘汰制度比較嚴格，因此同學們都能腳踏實地，切切實實地用功讀書。二十年後的學生，因必修科目減少（大半都是三科目中任選一科目等），教育部又爲了使同學們能學習到一些較合乎時代需要——就業上需要之科目，乃自民國六十二年，放寬選讀科目，不單可越系選讀，還可以跨院去修讀對自己將來就職時有切身關係之課程。此一政策，對同學們開了一條方便之途，但對本系所開選讀課程，有時因過於理論化或不合實際需要，因此常有不少老師開了課沒學生選修，或只有一、二位同學選讀充學分而已。這種現象近幾年來愈來愈嚴重，除非老師給學生一個「甜成績」，否則這位老師只好每年領個乾薪過日子了！

第七：二十年前，一般國民生活相當清苦，學生在求學中，大半靠半工半讀維持生活或繳納學雜費。二十年後，國民的食衣住行等各方面生活大大改善，國民所得也提高很多，因此學生們大半都能由父母親給付學費，專心讀書，學生們所參加的課外及戶外活動也增加，大家都過着安和樂利的生活。

第八：二十年前，由於生活程度較差，學生們除了必備的工具書之外，無法如願購買太多的參考書。二十年後，因生活改善，圖書出版事業也較發達，圖書量也增加，學生的購買力也提高了。每當在坊間瀏覽購買圖書時，常看到從幼兒到大學生搬走大本小本的書籍，真羨慕今天的主人翁們，太幸福了！

第九：二十年前的學生宿舍與今天的學生宿舍，真有天壤之別。記得當時大部分的宿舍，都是六人至八人擠住一間約一坪半的小房間，沒有一張像樣的桌椅，更沒有什麼書櫥，浴室也簡陋不堪，真是可憐透了！

第十：二十年前的校舍，非常簡陋，規模也不大，沒有今天那巍峨矗立的校舍和各學院學系的各種新設備和新儀器。記得大一剛入學時，在大門左側有一排又舊又矮的木屋——叫「臨時教室」，我們有不少課程是在那兒上的。當時全校最新的建築物就是現在的「普通教室」；如今從行政大樓到各學院系館都改建或增添新式高樓，讀書的環境也隨着改善了許多，唉！如果我再是一個「新鮮人」的話，那該多好！

×××

二十年的變化實在太大！可是我却故我依然，只求淡泊寧靜，勤儉自持，堅守主義原則，在安定中求進步，求發展。如果可能的話，我還要繼續走上另一個一十年，更充實自己，和同學並肩學習，相互切磋，貢獻所學，服務桑梓。

六十九年八月卅一日脫稿

